应对困难，迎接挑战：

结合政府工作报告，委员建言经济发展！

本报记者 崔吕萍

四分之一篇幅说成绩，四分之三篇幅话发展。李克强总理所作政府工作报告，更像是新一年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行动指南。结合政府工作报告，对于今年我国经济发展，委员们有怎样的建议？

议政建言经济“行动指南”

3月11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吹风会，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向东介绍，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共补充修改92处，从梳理代表委员意见建议的情况看，基本上对《政府工作报告》各项工作内容都有涉及。总的看，今年《报告》的补充修改主要集中在稳经济、促创新、惠民生三个方面。 稳经济方面，涉及财政、货币、就业政策以及保供稳价、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等内容。比如加大金融对实体经济有效支持方面，将“推进涉企信用信息共享”补充修改为“推进涉企信用信息整合共享”；落实落细稳就业举措方面，补充了“加强灵活就业服务”“大力营造公平就业环境”“加强劳动保障监察执法”等；确保粮食能源安全方面，补充了“继续做好能源、重要原材料保供稳价工作””打击哄抬物价等行为”。 促创新方面，涉及支持基础研究、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支持制造业发展等内容。比如，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方面，补充了“提高基础研究经费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深化科技评价激励制度改革”等；加大企业创新激励力度方面，补充了“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推动制造业、数字经济发展方面，补充了“大力推进智能制造”“培育数据要素市场”“提高应用能力”等。

惠民生方面，代表委员的意见建议比较集中，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服务等领域修改近30处。

认真研判宏观经济形势

结合政府工作报告的修改，在小组讨论中，委员们对于今年经济运行的宏观背景，有哪些判断？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苏波表示，我国仍是发展中国家，“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十分重要，要重视发展的协调平衡，去年出现的拉闸限电情况，除了我国经济恢复和全球经济需求增长导致电力需求增加的客观原因，也反映出在把握促进发展和环境治理的平衡上，我们还要下更多功夫。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世锦表示，2021年国内生产总值按不变价计算，增长8.1%，由于汇率升值按现价美元计算，增加了3万亿美元，而汇率升值与高质量发展直接相关，在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和诸多风险挑战的情况下，能取得如此成绩实属不易，很值得研究。同时，要进一步释放城市化、结构升级、新动能三大经济增长潜能，重视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助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全国政协常委、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李稻葵表示，最近几年中国经济增速出现下降，其中的问题不容小觑。为此一方面建议对民营经济先明确红线，之后推动切实松绑，想方设法调动其发展积极性；另一方面，建议对地方政府减少考核和问责指标，把地区人均收入增长作为核心指标，把部分地方债务转为国债，激发发展经济的积极性。

全国政协委员、兴业银行原董事长高建平表示，今年经济增长压力较大，应更多关注小微企业的困难，为此建议各级政府建立专门的信息反映通道，更多地听取小微企业的困难和意见建议。

全国政协委员、交通银行原董事长牛锡明认为，当前国际环境更加复杂多变，国内经济增长也面临着 “三重压力”如何保持经济5.5%的增速，实现经济社会均衡发展难度很大，这些都需要政协发挥独特优势，认真做好凝心聚力的工作。

关注聚焦微观领域改革

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白重恩表示，实现共同富裕，机会均等是基础，在三次分配之前应强调“零次分配”，以推动包括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土地、技术、数据和生态及相关的权利机会均等。比如在企业经营方面，让每个企业获得资金的机会均等，数据要素也可以参加分配，数据产生的价值如何参与分配要好好思考，做好“零次分配”既公平也高效。有利于后边的三次分配，更好地推动共同富裕。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证监会原副主席姜洋表示，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今年要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这是资本市场的重大改革，自两年前在科创板、创业板先后开始股票发行注册制试点以来，注册制理念已深入人心，市场各方应对注册制股票发行的能力得到明显提升，资本市场持续平稳健康发展，已具备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条件，为落实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要求，建议监管部门努力维护资本市场平稳健康发展，以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为牵引，推进资本市场全面深化改革，同时强化资本市场功能发挥，持续巩固资本市场重点领域风险防控成效。

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和诸多风险挑战，全国政协委员、百度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李彦宏表示，要实现今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5.5%左右的目标，仍面临不少的压力，“作为来自科技型企业的委员，我认为应从提升国家创新能力入手，在政策端不断刺激创新供给，带动高质量发展，比如在智能交通领域，要做好政策加减法，为企业创新消除制度障碍，尽快占据全球创新高地。”李彦宏表示。

全国政协委员、天津中沙泰达工业园区管理有限公司副董事长管学斌认为，政府工作报告特别提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在全球产业链重新布局、产业链区域化加剧、传统的贸易方式受到潜在的挑战的非常时期，我们应未雨绸缪，充分利用已有的海外园区资源，主动有序开展对外投资，稳步拓展合作新领域，充分融入“一带一路”所在国的本地化、国产化的产业布局、产能合作行为，突破常规贸易方式的局限，共享发展的机遇和成果。

要顺利完成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大学民营经济研究所所长杨德才建议，深化减负行动，加大纾困帮扶力度，拓宽民企融资渠道，完善风险化解措施。同时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健全完善常态化政企联系服务机制，营造全社会关心关爱企业家氛围。另外，要精准制定政策，高效促进政策落地，打造更加公平公正的营商环境，稳定市场主体预期。

全国政协常委、市场监管总局原副局长马正其建议，加大政府性融资平台的欠债清理，各地政府换届以后应积极出手化解债务风险，不能新官不理旧账，一定要负责到底，取信于民，以维护市场秩序。与此同时，上级要为下级政府营造地方敢负责任、敢于担当的环境，完善对下级政府的考核管理的办法，进一步建立 健全鼓励开拓创新、积极作为的容错机制， 减少一些不必要的一票否决。

毒草、牦牛、神奇的河

——全国政协委员谷树忠的履职小故事

本报记者 李元丽

2022年是本届委员履职的最后一年，谈及履职过往，长期从事资源环境政策研究的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三级职员谷树忠研究员与记者分享了几则他履职中有趣的小故事。

没有毒草

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和民族宗教委员会，一直高度关注草原生态保护问题，为此开展了多次专题调研，召开了多次专题座谈会。记得，有一次座谈会上，国家林草局的一位同志旗帜鲜明、理直气壮地说：自然界根本不存在毒草！这一说法立马引起大家的兴趣，目光都投向了他。

这位同志接着说，过去我们吃不饱穿不暖的时候，就是一味地向草原要肉、要奶、要皮、要毛。现在不一样了，草原作为生产资料的重要性在下降，而作为生态系统组分的重要性上升了，过去那种以牛羊能不能吃、爱不爱吃为标准来评价草好与坏、有毒无毒的做法现在已经过时了，要以对生态系统稳定性、功能性的贡献来评价，对牲口有毒对生态有益，就不能看作是毒草。

他甚至还说，有些草对牲口有毒、让牲口不能吃不敢吃，在某种意义上讲也是草自我保护使然，也有助于草畜平衡！

这些说法，自然引起大家的议论，议论之后，大家又对此深表认可。

由此，“世上无毒草”的理念开始在大家心中逐渐弥漫开来。

邂逅牦牛

2020年9月，我参加了全国政协领导同志带队的黄河上游生态保护专题调研。当行走在青海省黄河源区扎陵湖、鄂陵湖之间时，偶遇藏野驴、野牦牛，藏野驴警觉性高、不易接近，而野牦牛似乎“见过世面”，我几次试着接近它，我靠近它多少米，它就退后多少米，总是一边紧盯着我，一边悠闲地吃着草，牦牛、蓝天、白云、绿草相映成趣，煞一番引人入胜的田园风光！

由此我联想到，美丽中国正在全国各地不断变成现实！愿我们早日建成天蓝、地绿、水清、土净、景秀、居美的美丽中国！

神奇的河

2021年8月下旬，我以全国政协委员和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理事的身份，参加了“贵州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再出新绩”的专题调研，其中赴赤水河流域就山水林田湖草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实地调研，亲眼目睹了神奇的赤水河，遥想80多年前，毛泽东主席指挥红军四渡赤水，成就了英雄河的美誉；走进茅台镇，感受到了美酒河的芬芳；放眼望去，一片郁郁葱葱、碧波荡漾，更显生态河之本色。英雄河、美酒河、生态河交相辉映，是当今赤水河流域政治文明、物质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设协同高效推进的生动写照，更加坚定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

“听完故事，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这些年最大的感受就是，在路边、在田间、在河岸、在林间，随着生态环境治理力度的不断加大，‘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深深映入大家的心里，‘蓝天’不再稀罕，老百姓也不总是在朋友圈‘晒蓝天’了。我们都意识到了优良的生态环境就是最宝贵的财富、最靓丽的招牌。”谷树忠高兴地说，我们需要长期坚持下去，造就更多、更好的绿水青山。总之，履职是快乐的，履职是有趣的。如再有有趣的故事，我愿意再与大家分享。

“五化”助推交通行业实现“双碳”目标

本报记者 李元丽

当前，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速、跨区域交流的增多以及经济结构的优化转型，交通运输行业正在成为温室气体的显著排放者，并成为排放量增长最快的行业。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航空油料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周强两会期间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2021年，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工作取得新成效，年末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4.72%，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加快推进，以北上广深等为代表的特大城市正在逐步形成跨行政区域的一体化城市圈，其交通服务的范围、空间和规模持续扩展，导致交通碳排放不断增加。

周强表示，交通运输行业是高能耗、高排放行业。从美国等已实现碳达峰的主要发达国家发展历程看，交通部门能耗占终端能耗比重大，基本上都稳定在20%到40%之间。“数据显示，交通领域的碳排放占我国终端碳排放的15%，过去9年，这一领域的碳排放年均增速在5%以上。2019年，中国交通运输领域碳排放总量11亿吨左右，占全国碳排放总量10%左右，其中公路占74%、水运占8%、铁路占8%、航空占10%左右。公路运输中重型货车的碳排放量最大，占公路运输总量的一半左右，重型货车和乘用车是我国公路运输、交通行业的减碳关键。”周强给出这样一组数据。

那么，交通行业“减碳”面临哪些挑战呢？周强表示，从需求侧看，交通运输的需求依然强劲旺盛。就外贸货物运输来看，依然保持长期增长态势，大宗散货运量未来一段时期内保持高位运行状态；东部地区货运需求仍保持较大规模，中西部地区增速将快于东部地区。运输需求总量增长必然会带来交通运输碳排放量持续增加。从供给侧看，低碳交通供给尚未形成主力。绿色交通水平还不够高。目前，我国城市交通能源消耗大约90%仍然依靠传统能源，即使是纯电动车，其消耗的绿色电能占比为15%左右，因此，加大能源结构调整非常重要。

“如果能源结构不转型，即使都转移到公共交通出行，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交通碳达峰的问题。”周强如是说。

在周强看来，需从减碳工作法治化、空间布局科学化、运输结构低碳化、运输装备清洁化、创新驱动常态化等方面采取措施，助推交通运输业尽快实现碳达峰、最终实现碳中和的战略目标。

为此，周强提出了以下几点思考：一是做到减碳工作法治化。建立跨部门的长效领导机制，以有效控制二氧化碳排放为核心，统筹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与经济社会发展。组织推动中国企业密切跟踪业务所在地和产业链各环节涉及的相关国家碳中和气候法规和政策要求，尤其关注关键产品和核心零部件的气候法律技术制约，梳理碳约束产品和技术壁垒清单，并提前做好对策，规避风险，降低成本，实现业务可持续发展。

二是做到空间布局科学化。优化产业布局实现源头减量，打造交通与城市协调发展的低碳生活模式，明确在有轨道交通建设规划的城市，必须同步编制轨道交通沿线和车站的控制性详细规划，保证轨道交通与周边用地的一体化开发落到实处。

三是推动运输结构低碳化。提高铁路和水运的通达性便利性。建立以高铁和铁路为骨架的城际客运体系，提升铁路运能，提高铁路货运服务质量和水平。在深入推进多式联运发展，建立高效的陆——港——水综合调度体系的同时，全面提高工矿企业的绿色运输比例。

四是加快运输装备清洁化。加速车辆能源结构零碳转型。尽早出台面向碳达峰、碳中和的机动车电动化发展路线图，进一步加大存量燃油车替换为新能源车的政策引导力度，为新能源汽车使用创造有利环境。积极推广智能化、轻量化、高能效、低排放的营运车辆，推动车辆燃料消耗量限值和车辆碳排放标准提升。

五是创新驱动常态化。推动核心技术攻关。设置国家和企业重大技术专项、引导企业布局重点实验室等方式，加快推动重大核心技术攻关，突破氢能、储能等领域技术制约，加速碳捕获、利用与封存工业化应用推广，培育转型发展新优势，掌握新一轮国际绿色竞争主动权。

聚焦高水平对外开放，委员问了三个“人事问题”！

本报记者 崔吕萍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多次提出，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并具体提及了开放的领域和具体举措。在多位全国政协委员看来，促开放有利于我国夯实双循环这一新发展格局。开放过程中，人作为万事万物连接的纽带，更需要得到特别关注。

国际关系学有必要成为一级学科吗？

2021年1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发布了《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专业自录（征求意见稿）》及管理办法，拟在“交叉学科”门类下新增“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如果增设成功，区域国别研究将正式成为一级学科，这将是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进程中的重要一步，并将显著提升我国区域国别研究和人才培养水平。

当区域国别研究成“学”，引申出一个问题，即它与国际关系研究之间的关系。 “为了从整体上推动国际问题研究的深化与发展，进一步提高我国国际话语权，我建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适时将国际关系学设立为与区域国别学平行的一级学科。”谈及此，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这样说。

提出这样的建议，张宇燕自有道理。

首先，国际问题研究的重要性，在百年变局时代变得前所未有地突出。国际问题研究主要由国际关系和区域国别研究两部分构成，它在我国深化对外开放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其次，国际关系学和区域国别学相辅相成。作为国际问题研究的两大支柱，区域国别研究聚焦各国家行为体或国家集团本身的内政外交研究，国际关系研究则侧重国家行为体或国家集团之间博弈互动的研究。两者的合理分工与合作构成国际问题研究的完整体系。

另外，如果国际关系学能够成为一级学科，高校院系设置与调整也将因此变得合理顺畅。“目前我国诸多重点大学均设有国际关系学院或国际关系研究院，后者与经济学院、法学院等以一级学科或学科门类命名的学院是平行的，并且已经形成了成熟的教学科研体系。作为政治学二级学科的国际关系和作为一级学科的区域国别学并立局面，有可能掣肘国际问题研究与教学体制机制的创新与发展。”张宇燕这样说。

张宇燕同时建议，待条件成熟时，还可以考虑将“国际问题研究”设立为独立的学科门类。国际关系学和区域国别学作为“国际问题研究”门类下的两个一级学科，其关注领域覆盖区域国别、大国博弈、和平发展、全球治理、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等地缘政治经济重大议题。

我国吸引人才举措精准性还能提升吗？

综合国力的竞争关键看科技，科技能否领先的关键看人才。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吸引高科技人才，产生了积极成果，出现了留学生回流的趋势，有些领域还引进了高科技领军人物。

“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对高科技人才的吸引力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的一项研究指出，全球顶尖的人工智能研究者中，有59%效力于美国大学和公司，11%效力于中国大学和公司，10%效力于欧洲大学和公司。而在效力于美国大学和公司的人工智能人才中有29%的人本科就读于中国。随着拜登政府以‘小院高墙’战略与我国科技‘脱钩’，科研人员跨国交流合作严重受阻，吸引高科技人才的形势更加紧迫。”要解读这一急迫性，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前院长季志业认为，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吸引人才的举措不够精准。 “迄今，我国在吸引国际人才方面的主要举措，一是提供资金，包括科研经费、高收入、高分成回报；第二，我们提供入境、入籍、办企的良好服务；三是提供住房等优惠待遇。这些政策都是必要的，但还不够精准。通过与科研人员座谈，我们了解到了他们的一些真实想法，他们最需要的是时间、精力、团队、仪器设备、设计软件、实验环境，以及与这些需求相配套的资金。然而，其中有许多东西，特别是时间和精力无法用经费买来。”

为此，季志业建议，相关部门为了吸引更多优秀高科技人才，一是尽可能为科研人员减少一般性的学习和会议，保证他们充分的科研时间；二是改革科研职称体系，让职称适应各学科、各领域的人才需求；三是简化科研经费的分配方案和报销程序，发挥其激励科研人员而不是困扰他们的作用；四是加快教育、医疗、社区等社会保障体系改革，让包括科研人员在内的全体人民不断提高舒适度和幸福感。

如何重视在外劳务人员心理健康问题？

近年来，在“一带一路”建设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指引下，我国对外经济合作稳步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已有4万多家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分布于全球的188个国家及地区。我国每年对外全行业直接投资也已达1300亿美元左右，位列世界第二。

在此背景下，我国需要派遣大量管理和专业人员参与海外投资和建设。根据商务部统计，我国近年每年在外各类劳务人员60万人左右。

“这些外派人员，尤其是管理层，其身心状态关系到其决策水平和工作效率，直接关乎我国海外资产的安全和价值。”在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大学教授张水波看来，外派人员的工作有其特殊性，比如人身安全隐患多，工作节奏快，文化冲突带来的压力大以及社会环境的快速变化带来的家庭关系不稳定。这些问题极大地影响了外派人员出国工作的积极性，导致身心健康出现问题的比例比通常情况要大得多，从而大大降低在外的工作质量。

为支持我国对外高水平开放、推进“一带一路”高质量建设，围绕这一人群的心理疏导，张水波想到了一些办法。 “从前端说，我建议尽快建立科学的海外人员选配体系，加入对人员身体心理素质的考评。通过各种人格测试、职业倾向、心理健康水平测试等，可以对人员的个性倾向、品德、职业动机等有初步判断。不但要考虑选派人员的专业知识能力，而也要看人员心理素质，出国工作意愿，以及家庭支持等。对于被选定出的人员，建议在准备工作中，加强心理健康方面的培训。”张水波这样说。

而在外派任职期间，企业或相关机构也要为员工提供心理健康辅导和咨询。我国企业一般在国外团队中都有随队医疗医生，但普遍没有心理大夫。未来要在派遣人员中增加心理医生，以便随时对人员进行心理干预和咨询。 外派人员归国后的心理健康水平，同样需要受到关注。“有些国际工程项目人员常年在外，与国内社会联系较少，员工回国后可能发现企业组织、人事方面都较出国前有较大变化，同样需要心理上的调节和适应。企业也应按照之前制定好的职业发展计划做好归国人员的安置工作，提高员工的忠诚度和工作热情。”张水波这样说。

他还建议，涉外企业和相关机构应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和保护政策，维护外派人员的切身利益。我国国家相关部门可以出台相关政策或法律法规，将“员工援助计划”纳入对企业的刚性要求，对外派员工定期强制休假、权益保护作出清晰具体的规定。特别是在新冠疫情下，应为此类涉外人员的回国休假优先安排航班。

首批离岸贸易中心城市 厦门“借东风”

本报记者 照宁

“国家商务部近日表示，将培育一批离岸贸易中心城市。”全国政协委员、厦门市工商联（总商会）主席柯希平带着思考，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提交了一件《关于支持建设厦门离岸贸易中心城市的建议》的提案。

“厦门有经济特区、自贸区的叠加优势，可以更好地推进离岸贸易在金融、税收、人才、立法等方面的创新探索，希望商务部支持将厦门列为首批离岸贸易中心城市（地区）。”柯希平委员认为。离岸贸易对进一步营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营商环境、吸引高端人才集聚、促进国内外双循环，促进外贸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厦门从2018年起积极探索离岸贸易工作，实施了出台税收扶持政策、简化外汇操作流程、建立风险防范机制等一系列配套举措，为国家外汇体制和税收体制改革积累了经验。”柯希平委员在调研中发现，厦门2021年获评国家外汇管理局五个新型离岸国际贸易试点城市之一。在主体培育方面，厦门已有建发、国贸、象屿三家世界500强企业以及紫金、港务、航空开发、信达等集团内30多家境内成员企业参与离岸贸易业务；在业务规模方面，截至2021年底，厦门已累计办理离岸贸易外汇收支业务243.73亿美元，仅2021年业务就突破百亿达111.88亿美元，比增62.9%，业务规模居全国前列。“如能将将厦门列为首批离岸贸易中心城市，有利于为促进全国离岸贸易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创新示范。”